

《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頁 1-29

導 論

何翠萍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蔣 紛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一、人類學的族群與認同議題以及本書的旨趣

本書所收錄的論文，從分散在東南亞、台灣、中國各地方的華人、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互動，來討論不同政治經濟歷史脈絡下的族群關係議題。所有的論文，都來自「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人類學組(I)的研討會。¹除了王賡武院士的論文原為「族群關係組」的主題演講之外，其餘論文則各自發表在五個議題小組中，包括：徐正光教授組織的「福佬與客家：族群關係基礎範式」、麥留芳教授組織的「華人與土著：海外的族群關係」、蔣斌組織的「華／漢與南島民族：脈絡化的多數與少數」以及何翠萍組織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同化與全球化」和「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深度民族誌」。現在經過編輯的過程，

¹ 研討會後，在會議論文編輯的過程中，議定由莊英章教授、麥留芳教授、蔣斌及何翠萍組成編輯委員會。而後再決定由蔣斌與何翠萍擔任本書的編輯。在此要感謝莊英章與麥留芳兩位教授的支持與協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黃應貴先生在編輯過程中的支持，所有評審人的寶貴意見，以及編輯助理張桂華小姐任勞任怨的行政支援。出席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的學者中，莊英章與林秀幸、柯志明、Erik Mueggler、Leo Suryadinata 以及 Rosey Ma 的論文將另行發表，故未能收錄在本書中。

將這些論文收錄成一冊，以「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為主題，其實嚴格地說來，本身就是為這些論文進行一定程度「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過程。當代語言人類學者對於社會文化現象研究的重要啟發之一，就是除了肯定就意義的承載而言文本(text)與脈絡(context)缺一不可之外，更進一步導正在研究中經常出現將文本與脈絡本質化(essentialization)或實質化(reification)的謬誤，從而揭示「過程」(processes)與「表演」(performance)的重要性，將焦點由靜態的「文本」(text)轉向動態的「文本化」(entuxtualization)；由靜態的「脈絡」(context)轉向動態的「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除此之外，尤其重要的是導引出文本化過程所意味的「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與「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可能性(Hanks 1989; Bauman and Briggs 1990; Silverstein and Urban 1996)。²

本書論文所處理的社會文化現象與歷史過程，及其所呈現的人類處境，都圍繞著一個共同的焦點：那就是某一種族群性或族群觀念被脈絡化的過程。論文中所描述分析的社會文化現象與歷史過程，一方面構成了特定族群觀念被認知與被賦予意義的脈絡；另一方面，族群觀念與族群關係的作用，也使得這些現象與過程，有別於其他的社會文化現象與歷史過程——它們或者透露出當今世人似乎仍然無可逃脫生活在一個族群化世界中的悲劇處境，或者是指向一個與全球化普同化願景糾纏不清，持續因為族群意識以及受族群意識支配的資源分配不公產生紛擾，而更加不確定的未來。

族群議題之所以格外具有道德的負荷，主要因為族群性是當代思潮及論述中最容易受本質論(essentialism)拖累的觀念之一。和「親

² 文本化就意味著文本本身就可以是過程中競爭協商的產物，也意味著文本被帶離原先脈絡，放置到另一脈絡中，重新參與意義建構的可能性。文本化的過程以及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可能性，就是論述表演有效性得以發揮，同時接受檢驗、評價的場域。

屬」、「性別」一樣，「族群性」也常被賦予某種「自然」(naturalness)的意涵。即便是以列舉文化要素為基礎的族群觀念，也往往隱涵著文化傳承範圍與「血緣」傳承範圍相一致的假設。但是，誠如人類學者 Jocelyn Linnekin 與 Lin Poyer (1990:1-5) 在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一書開宗明義指出的：這種蘊涵生物、血緣或「自然」要素的「族群性」概念，其實是西方社會的一種俗民理論 (ethnotheory)，隨著「西方」的政經優勢而成為社會科學的概念。這樣的沿用，造成人類學族群研究中困擾的主要來源。對於以研究不同文化觀念與表徵體系為職志的人類學者而言，其中最為夾纏不清之處，用 John 與 Jean Comaroff 在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一文中 (1992:49) 的話說，就是：「我們究竟是把『族群性』當作分析的對象，也就是視之為一種需要被解釋的現象；還是把它當作一種解釋的原理，認為可以用它來闡明人類生存狀態中某些其他的現象？」或者用該文引用的蘇格拉底寓言來說：我們應該只是透過一面放大鏡去研究世界，還是反思地探討這面放大鏡的性質？

人類學的發展擁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就是不斷自我省視理論與概念體系中因特定個別文化觀念干擾所形成的盲點，進而尋求超越這類盲點。尤其是對於孕育人類學的「西方」社會中固有的俗民理論，往往不經意的被沿用為社會科學理論的普同性預設，更是人類學者時時提防的陷阱。親屬與性別的研究中隱涵的生物預設，就是明顯的例子。族群性的研究亦然。Linnekin 與 Poyer (1990:5-15) 依據大洋洲的民族誌資料，提出人群分類與身分界定的方式，可以分為強調「先天」特質的「孟德爾模式」(Mendelian Model)，以及強調後天特質的「拉馬克模式」(Lamarckian Model) 兩種。孟德爾模式以個體生物人的獨立自主性為基礎，認為人在出生前與出生後所獲得的特質，在本質上極為不同。出生前所獲得的特質具有可傳承性，而且在個人身分的界定上重要性較高。拉馬克模式則不對出生前後獲得的特質做明顯的區

分，而且不以個體生物人的獨立自主性為前提，反而是強調個體與環境（包括土地、食物等「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互動、學習所獲得特質對於身分界定的重要性，並且凸顯一種集體社會構成的人觀（*consocial personhood*）。Linnekin 與 Poyer 指出：孟德爾式的人群區辨模式，比較接近「西方」強調「出身」的族群觀念；而拉馬克模式，則是一種遍存於大洋洲的認同的觀念。在此必須注意的是：從人類學的觀點而言，即使是所謂「先天特質」，也是由文化所界定的一種認同觀念（cultural identity），而且是在某種特殊的歷史脈絡中所形成的觀念與範疇。換言之，即使是西方生物學或遺傳學所做的辨識，也無非是這些特定社會在特定歷史情境脈絡中發展出來的一種文化區辨系統。Linnekin 與 Poyer 的論點是：人群的區辨與認同，可以依據的標準相當多元，並不必然以先天出身為準，「出身」更不一定是各個時代或各個社會中始終最具支配性的認同依據。³因此，在族群性與族群意識的研究上，最關鍵的問題反而是：在什麼情況下，（強調先天出身關係的）族群性成為一個社會體系中如此重要的象徵（ibid:11）？⁴目前一般的理解是：強調「先天出身關係」的認同，雖然並非西方所特有，但由於殖民主義的國家擴張和現代國族與國家意識的鼓吹，使得它成為當代最普遍的一種認同形式。

3 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這裡所說的人類學文化認同的研究指的是（不同）文化對認同區辨的研究，而與多數中國研究的著作中所指的文化認同——如對「中國」、「華夏」或「漢」文化的認同——並不相同。前者有「不同文化可能有不同的認同原則」的預設，後者則無（何翠萍 1999, 2000）。詳見下節「中國認同議題的特殊性」。

4 Linnekin 和 Poyer (1990) 強烈主張：族群研究真正的目的是在探討不同民族的族群理論（ethnotheory），而不是認定他們必然有的就是出生認同的理論（亦見 Astuti 1995b:464-5）。族群理論研究的挑戰在於讓人們瞭解有另類的建構認同和區辨異己的方式。他們認為族群性（ethnicity）是一套基於人們認為他們是誰是緣於他們天生是誰的認知前提而來的理論。這種出生認同的理論認為人可以依據他們的出身背景所形成在形貌和行為上的不同而區分為界限分明的個別群體（Linnekin and Poyer 1990: 2）。但事實上，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思考，並非所有的認同理論都是同樣的，族群性只是多種文化認同模式中的一種。

有關「孟德爾模式」與「拉馬克模式」的差別，以及「先天身分」同樣受文化所界定，在Rita Astuti (1995a, b) 在對於馬達加斯加西海岸 Vezo 人的研究中，有清楚的呈現。Astuti 發現 Vezo 是一種典型的基於拉馬克認同模式產生的人群標籤。Vezo 人是從人們「做什麼」與「住在哪裡」來建構他們特有的「族群」認同理論。在 Vezo 人的觀念中，「Vezo 並不是一種人」而是「一群在海邊討生活的打漁人」。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用人的出生的角度來區分己與異己，而是用生計生活的角度，「我是誰是因為我做什麼」，「Vezo 人就是做事像 Vezo 的人」的角度來形成認同。Vezo 人的認同強調的是人在當下的生計生活方式，而不是過去或未來。當 Vezo 人搬到內陸改做農活時，他們也就不再是 Vezo 人了。Vezo 做為一種認同的標籤，只存在於當下不斷地學習、成就和行為當中，而沒有任何從過去或歷史所延續來的牽絆 (1995b:478)。

但是在另一方面，Astuti 也發現 Vezo 還是有另一種依據文化所界定的「先天身分」而來的認同原則，那就是對世系 (*raza*) 的認同 (1995a)。這種對世系的認同完全不同於 Vezo 人對當下「做什麼」的認同，它是對與共同埋在一個墓穴中的祖先的認同，是一種由於過去的連結所造成的天生的、不可改變的認同。與非洲相當普遍的世系認同模式頗為類似，它在人身上刻上固定且改變不了的標記。由於這兩種認同是如此的不一樣，Vezo 人清楚地區分生者的世界與死者的世界，使兩界間一方面涇渭分明，另一方面生死之間的界限又時時被生者和死者的「影子」所干擾，死者的影子常來糾纏生者，生者流動與歡愉的影子也常讓死者在被祭祀的時候流連忘返。

Astuti 的 Vezo 研究，不但呈現出一個人群可以有不只一種的認同模式，孟德爾模式與拉馬克模式可以並存，更進一步揭示了這兩種模式如何連結在一個整合的人觀脈絡中，使 Vezo 人的生存世界富有意義。尤其饒富趣味的是：馬達加斯加的地理位置，使得島上的人群，

主要分為中央高地的南島裔族群與海岸地區混合的非洲裔與印裔族群。Vezo 的例子令我們必須自問，是應該把兩種認同模式之一視為源自南島血親型（cognatic）認親原則，另一則視為源自非洲的世系（lineal）認親類型的認同原則嗎？如此我們要如何解釋在 Astuti 人生與死之間的溝通與流動？Astuti 認為：或許 Vezo 的例子正是要提醒我們：希望南島研究的人類學能意會到非洲人類學的「影子」，而非洲人類學研究也能意會到南島人類學研究的「影子」。

Linnekin 與 Poyer 清楚的說明了：孟德爾式族群觀念之流行，與殖民主義及國家體制擴張的歷史脈絡，其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事實上，在人類學的討論中，認為「族群」無本質，其意義往往由脈絡所決定，也一直是少數具有高度共識的意見之一。不僅可以說 Fredrik Barth (1969) 對於「邊界」的強調，實際上就是凸顯脈絡的重要性；所謂的「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或者「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m or situationalism) (e.g., Cohen 1969; Mitchell 1969) 等學者，⁵ 更是以族群意識被操弄的社會脈絡為主要的研究課題，特別是在殖民體制下市場經濟所帶動興起的多元化都市情境。即使一般討論常引 C. Geertz 為「根基論」(primordialism) 的代表，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在〈整合革命：新興國家中的根基情感與公民政治〉（“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1973) 一文中，Geertz 整個對於所謂「根基情感」或是「根基歸屬」的討論，實際上也完全是在新興國家（newly

⁵ 族群研究中常被引用的人類學者，以及主要的研究，和曼徹斯特學派的研究取向有密切的關係，探討的主題集中在非洲都市情境中人們如何視情境需要操弄各種以「部族」為基礎的人際關係網絡，這些研究經常使用「部族主義」(tribalism)一詞。此外，J. C. Mitchell (1966:52-54) 也將「族群性」視為「範疇關係」(categorical relationship or categorical order of relationship) 的一種。範疇關係是都市的多元情境中，人們為了日常生活的進行，以刻板印象為基礎，將交往的對象簡化分類，據以決定應對模式的關係架構。

independent states) 的脈絡中進行的。我們可以說，Geertz 這篇文章的重點是新近獨立國家中「根基情感」所構成的聯繫對於國家穩定所形成的威脅，文中看不到他有意圖直接用「根基情感」來界定「族群性」。⁶

族群性做為人群區辨及分類觀念的一種，其結構特性與形成、發展的脈絡，在 John 與 Jean Comaroff (1992) 的〈關於圖騰意識與族群性〉（“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一文中，有至為清晰周延的討論。他們對於族群性提出了五個命題。⁷ 其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點。第一，他們清楚地指出了普遍出現的兩種人群分類法則——族群分類與圖騰分類——二者間的異同。圖騰分類是由結構相似的群體單位所建立起的相對而言較具有對稱性 (symmetrical) 的分類體系，而且這些單位並不需要整合在一個政治經濟體制之下；族群分類則是

⁶ 「在純粹描述的層次上」(Geertz 1973:261-263)，Geertz 列舉了這種對國家不滿的根基情感得以凝聚的焦點包括：「假設的血緣」(assumed blood ties)、「種族」(race)、「語言」(language)、「地區」(region)、「宗教」(religion) 和「習俗」(custom)。

⁷ **命題一：**族群現象並非如韋伯傳統學者的意見，源於根基情感(primordial ties)，其實經常是由特定的歷史威力 (forces) 所產生的，這些威力既是結構的，也是文化的。**命題二：**族群並不是一個單一的事物(a unitary thing)，它同時指涉一組關係與一種意識；而且，它對於不同社會群體所具有的意義與實際面的重要性，因該群體在社會組織秩序中的地位而有不同。但做為一種意識，它往往只是許多種「人／我」意識中的一種——圖騰意識是常見的另一種——這些不同的意識都是特定歷史結構的產物，這些意識衝撞著人類的經驗，並且制約社會行為。

命題三：圖騰意識的產生是在結構相似的社會群體間，建立起對等的(symmetrical)關係，這些對等的群體不一定整合進到一個政治體系裡；族群意識的產生，則是基於結構不同的社會群體，以不對等的(asymmetrical)統合方式被納入單一個政治經濟體。

命題四：族群意識雖然是特定歷史過程的產物，但是它一旦形成了，就會披上一種「自然」且狀似獨立自主力量的外衣，有如一種「原則」，這種原則更足以決定繼起社會生活的走向。

命題五：當族群意識成為一個社會的集體意識中一種客體化的「原則」後，它可能會脫離產生這種意識的緣由，而依賴其他不同的因素永續存在，還可能獨立而直接的衝擊到原先產生這個意識的社會歷史情境 (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49-67)。

由結構上並不一定相似的群體單位所建立的不對稱的(asymmetrical)分類體系，而這些單位往往是同屬於一個政治經濟體制之下。所謂一個政治經濟體制，實際上指的也就是國家。或者更具體的說：就是具有一定經濟調節或是維持經濟秩序作用的殖民政體或獨立民族國家。換言之，John 與 Jean Comaroff 認為：「族群」的形成，或說以「族群性」為依據的人群分類形式的出現，必定是在某種國家體制的脈絡中，而且群體單位間往往有某種階序差異存在。其次，John 與 Jean Comaroff 也指出：一個族群意識的形成，在最初可能有其特定的政治經濟歷史因素，但是一旦形成了，就會篡奪取得一種「自然」且具有自主性的態勢。即使促使它形成的因素消失了，它還是會自主的延續下去，並且對後續的歷史發展產生影響。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摘要出這樣的理：「族群」是人群區辨分類的方式之一，不論是具有某種生物遺傳的內涵，還是假定文化傳承與血緣傳承在範圍上有某種程度的契合，族群通常是一種強調「先天身分」的區辨觀念。但是這種強調「先天身分」觀念，卻不是「先天」上就遍存於人類社會，它是在特殊的歷史脈絡中被建構、推廣的。既有的人類學研究在在指出，這個歷史的脈絡，最主要的就是以市場經濟為原動力的殖民主義擴張，以及殖民政體與後續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在市場與國家的脈絡中建構並且存續的族群觀念與族群分類體系，往往內建著族群間的不平等關係。此外，族群意識的產生固然有其脈絡，這個脈絡促成了族群的「文本化」。然而族群意識一旦形成，就會篡得一定程度貌似「自然」的說服力，促成其文本性(textuality)相對的穩定。在歷史變遷之中，即使脫離了原來產生的脈絡，仍然可以被「再脈絡化」，由它的文本所承載的意義，與新的脈絡透過競爭與協商，產生新的意義。

本書論文所處理的歷史或民族誌現象，不論是否座落在政治疆界的「中國」境內，都與廣義的「華人」或「中國社會」有關。就如同

人類學界經常需要面對的狀況：任何以其他地區民族誌為基礎發展出來的理論，要通過普同有效性的考驗，以中國的材料進行驗證，通常都是最艱難的一關。由這些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做為族群形成、族群性建構的脈絡，不論是國家的內涵或者是市場的作用，都並不單純，而是各自有其獨特的發展歷程與多元的類型。猶有甚者，雖然在理論層次上，以及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我們可以將國家與市場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各自具有不同的前提與能動者（agent），依據不同的邏輯企圖實現各自的城府（agenda）。但是，由本書的許多論文裡，我們也看到兩者更可以是互相為用，甚至是難以區辨的。而即使是族群、認同、文化等做為文本的核心概念，也因為「民族」（nationality）觀念的引進，「認同」觀念的外來性（本書王賡武文），以及中國的族群互動歷史中「文化」概念的獨特且突出的地位，而使得情況更為複雜。本書的論文就透過對這些動態且複雜問題的探討與呈現，揭露了豐富多樣的族群意識文本化、脈絡化、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過程。

二、中國認同議題的特殊性

圍繞著中國或廣義的華人社會發生的族群議題，對照於上述人類學的族群理論，顯得格外複雜。就國家這個脈絡而言，必須將三個特別的形塑族群界限的因素，納入考慮。其一是對於「華夏文化」或「漢文化」的認同；其二是「異族」統治的歷史所激發的「漢」或「中國」的認同；其三是社會主義中國引入史達林式的「民族」（nationality）認同概念。按理說，以「華夏文化」或「漢文化」做為認同標準的人我區辨原則，應當只能衍生出著重後天學習的立場。⁸在這個立場上，

⁸ 例如韓愈《原道》中所說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族群之間的區隔勢必是與時俱變的，群體的界限具有高度的「可穿透性」(permeability)，也就是 Prasenjit Duara (1993) 所說的軟界限 (soft boundary)，或者王明珂 (1997) 所說的漂移的界限。然而，在這個具有悠久歷史的以接受華夏或漢文化的程度做為人群區辨原則之外，中國歷史上受異族統治經驗中的衝突、暴力與血腥屠殺，卻也催化出以先天身分為認同的依據，例如滿、漢之辨的原則。這毫無疑問地逼使族群界限逐漸趨向固定而不具有穿透性，也就是 Duara 所說的硬界限 (hard boundary) 的悲劇。

中國前近代 (pre-modern) 歷史中，因為異族統治而激發出的先天身分認同觀念(例如本書王賡武文)，與人類學研究(例如 Comaroff 或 Linnekin [1990] 的論點) 及近代中國歷史研究中普遍看到的(例如沈松僑 1997)，經由西方殖民統治經驗或接觸所激發出來的先天身分認同觀念 (例如本書 Dikötter 文)，二者間複雜的異同或轉換關係 (Dikötter 1992; Duara 1993; 沈松僑 1997)，是中國認同研究中無可迴避的議題。⁹ 而 1950 年代之後的中國，積極地傾國家之力，引進史達林式的「民族」概念，在全中國境內建立起一套高度固定化、僵化的族群分類模式與分類界限，更進一步增加了中國族群議題的複雜性 (Harrell 1995; Brown 1996)。

本書收錄的有關中國、台灣的論文，即透過探討人們主觀中「族群」、「民族」¹⁰ 與「國家」概念的形成過程，展現出中國族群認同議題的複雜性。多位作者都揭示出：(1)古代「華夏」、「中國」與「近代中國」政治體的界限和內涵，必須由其形塑的過程進行瞭解 (本書王賡

⁹ 正如 Duara (1993) 在〈解構中國〉一文中質疑近代中國國族國家主義是一種全新的政治認同，他認為這種說法是從現代化理論出發而產生的誤導。他強調近代中國的國家認同並不是一種嶄新的認同，而是來自歷史上既有但並不完全相似的認同觀念的轉換。

¹⁰ 在此專指 1950 年代開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所定義的人群分類單位。

武文、王明珂文、Dikötter 文與 Litzinger 文）；(2)一般常視為華夏或中國構成主體的「漢文化」的內涵（本書 Dikötter 文、施傳剛文）、「現代化」的內涵（本書 White 文、Schein 文）以及「漢」與「非漢」接觸互動關係中所最常被討論的「漢化」（本書楊彥杰文、Shepherd 文、White 文）或文化霸權（Harrell 1995；本書 White 文）的概念，都需要審慎的定義與反省；(3)知識分子、官僚系統或民族菁英，誰是「漢化」、「國家化」及「現代化」的能動者（agent），這些能動者是否與其族屬——中國人或非中國人，漢人或非漢人——有關？如何相關？這是一個必須注意的問題；(4)須瞭解實際族群接觸過程中，個別人群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所面對的「中國性」究竟是什麼？其內容及異同程度如何（本書 Shepherd 文、施傳剛文、Sutton [forthcoming]）？

多位作者都持有「族群乃關係構成」的觀點。在這個觀點下，他們清楚地呈現出族群界限在帝制中國時，如何與「華夏」、「中國」以及「漢人」等概念的形成，有彼此共構的關係，並且造成這些概念與概念代表的人群，其間界限的流動性與「可穿透性」。王明珂研究的北川羌人與漢人、楊彥杰研究的閩西畲瑤與漢人、John Shepherd 研究的台灣平埔與漢人、Sidney White 研究的 1949 年以前平原納西與漢人的例子均是。但是，在歷史的發展中，這種流動的族群界限卻在不同的脈絡下被僵化而造成悲劇的後果。王賡武院士描述僵化的滿漢族群界限所造成從十八到二十世紀以來滿漢衝突、屠殺的慘劇，已經普遍呈現在清社會史研究的著作中。本書許文雄的論文則描述十八、十九世紀的台灣，同樣肇因於不可穿透的族群界限所導致的閩客械鬥。Frank Dikötter 的論文敍述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為了締造現代新中國而逐漸形成的「種族論述」，如何更有系統地僵化族群界限。施傳剛的論文則描述當前滇北漢人與麼些之間如何由於僵化的「民族」界限和刻板的異己觀而自陷困境。

王賡武院士的主題演講從東南亞華人認同的例子勾勒出「中國」、

「華」、「漢」認同形成的複雜性。由中國本土不同族群統治的朝代更迭歷史，與十六世紀以來因為海洋貿易而移居東南亞的華人歷史的探討，王院士指出：外來的「他者」對於「我群」意識的產生與鞏固，至為重要。這些「他者」，包括在中國歷史上的異族——非漢族屬的金、元及清——統治者，十六世紀以來從東南沿海逼進的倭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非中國人的商人或侵略者，以及東南亞華人所面對的西方殖民者或土著政權及土著社群。這些他者，一則區辨了文化的界限與內容，亦即何為漢人與漢文化；二則建立了國家的我群意識，即對滿清異族統治的不滿，以及對前明志士的認同；三則激起了東南亞原本離散的中國移民對革命中國的同情以及文化上的華人認同。

如果說王院士對東南亞華人認同的勾勒，比較著重於宋、元、明、清以來，中國統治者、被統治者（包括儒家知識分子及一般平民百姓）對於族群界限的操弄、被操弄、超越或沈醉，而這個族群界限比較被認定是來自先天屬性且不證自明的；那麼本書其他作者的討論，就觸及了基本上受文化界定的更多樣化的認同模式（其中也包括文化所界定的「先天」身分的認同），這些模式如何形塑族群的界限與族群性的內容，以及這些形塑族群與國家的文本如何在歷史過程中被去脈絡化，進而再脈絡化至當代國家的族群關係中。

在一篇討論中國從七世紀（唐、宋時期）開始往南擴張以來，對於南方族群以「生」與「熟」做為區分依據的文章裡，Magnus Fiskesjo (1999) 認為生與熟是帝制中國標示國家主權的文化認同模式。中國的界限和內涵，是由尚未編戶成民而不受王法制裁，不納稅賦、不服繇役，且在文化上都是野的「生」蕃所界定的。界內邊地上的，則是已經成為「民」但仍待教化或同化而使之去除奇風異俗的「熟」蕃。教化的方式包括 Stevan Harrell (1995) 所說的儒家教化方案，或如本書王明珂的文章所說的「使之通漢語、知書識字、改蕃俗染華風」等。國家的界限既然是由文化上的生、熟來做界定，這個界限就必須依靠

武力的征服、去生變熟和不斷的教化來維繫，也因此而富於變動與穿透性。界限內中國文明或漢的內涵，就是對比於這些野蠻生蕃，和帶有些奇風異俗的邊民或熟蕃的文化高下關係來共同界定。在此的文化中國所界定的己與異己關係的理路下，本書幾位作者更深入地討論了帝制中國的漢化與國家的議題，同時從「邊民」或土著的立場討論不同的漢化或國家化的能動者，以及他們共同建構中國的邊界與內涵的過程。

王明珂的論文透過從漢晉到當代的兩千年間對於「禹生於西羌」說法的想像與詮釋，描述北川的華夏化、漢化與羌族化的過程。漢晉時期，北川所在的蜀地知識分子先是以「攀附華夏聖人」的方式，經營他們歸屬為華夏一份子的地位，且建立蜀地歸屬為華夏西部邊界的空間位置。唐到明以前中國國力不及此地，而吐蕃勢力強大。顯示在中國文獻上的，就是有別於「漢」的「蠻」、「蕃」等字眼的不斷出現。十六世紀中葉明代國力強盛，一直到清末民初，文獻上對北川居民的描述，用來和「漢」或「漢文化」相區別的「蕃」或「番俗」等字眼和描述就逐漸減少了。清末民初時無論從「村落住屋形式到居民穿著、語言」都「全然漢化」，其中也包括土著冠漢姓、考科舉和祭拜漢人平蕃英雄何卿、營建大禹故里等文化的模仿與攀附。從文化中國的觀點，無論他們天生血緣的族屬是什麼，可能是土著、漢晉以來陸續進入川北的逃荒難民、清初的湖廣移民，還是戍邊的官吏、屯兵之後，這些全然漢化的北川人都是漢人或華夏子民。

在王明珂的討論中，「漢化」的能動者是不分族屬的。他可以是代表國家來自外地的縣令，以強調此地為大禹故里的方式來經營華夏邊界，或是追求仕途的地方俊彥（可對照本書 Shepherd 的論文），這兩類人物都同樣地熱衷於經營以確保他個人所屬的世界。從上文所述 Linnekin 與 Poyer 或者 Astuti 等人對文化認同的討論看來，如此的認同模式顯有別於依靠先天身分所決定的族屬認同模式。的確，王文

所呈現的漢與非漢的定義是流動的，而非僵化的。他認為只有在視族群為「主觀宣稱的，可能隨況遇變遷的」，且其邊界是模糊的「認同範籌」條件下，我們才有可能界定什麼是「漢人」。而「漢化」就是漢人與非漢人在接觸過程中，非漢人在主觀上認同而成為漢人的過程。楊彥杰的論文採用與王文相當類似的「漢化」觀點，並將焦點集中在土著如何經營自己所屬的「漢文化」，如何廁身「中國」一份子的過程，藉以論證如今自稱為客家的閩西東山蕭氏，極可能是當地畲瑤先民在與國家接觸過程中逐漸成為「漢人」的。

漢化的機制，或者是 Harrell (1996) 所說的（漢的）「展現的論述」(discourses of unfolding)，在楊文的閩西材料中有更多樣化的呈現。雖然不如北川地區可以附會至華夏聖人大禹的傳說，但閩西蕭氏的知識分子仍然可以附會至名列正史的初唐重臣蕭瑀。除了這個「儒家化」的機制外，楊彥杰的論文還顯示出：閩西蕭氏「漢化」的過程中，還有十二世紀以來的「道教化」與十五世紀以來的「宗族化」兩個重要的機制。¹¹ 楊文認為：「道教化」的機制可由儀式過程中狗的地位，其類似「葦神」祭祀的特質，以及祖先蕭必達以道公的身分和社公鬥法的故事獲得闡明。「宗族化」的機制則見於閩西普遍流傳的「道公鬥社公」或蛇或狗等化身社公的傳說，與蕭氏宗族祖先傳說內容的相似性，以及朝廷平邊功臣蕭瑀的英雄情節，與畲族民族英雄龍期征番王情節的相似性，其中顯示二者共有對「國家化」過程的詮釋。加上祖先與社神合一，普遍見於閩西的「祖神信仰」。楊彥杰建議：我們必須同時考慮道教化、宗族化與儒家化三個過程及其機制，才能窺見這個漢化過程的一斑。

¹¹ 這一點和中國東南道教研究學者對道教化議題的認識（例如 Hansen 1999；Welch and Seidel 1981）以及社會史學家對宗族話議題的討論（如鄭振滿 1992；Faure 1996 等）有很強的呼應。

要瞭解「漢化」的能動者，必須從「漢」與非「漢」間彼此關係構成的立場加以考慮，而不能僅從「漢」加諸於「非漢」的片面教化觀點切入。¹²這個立場不僅清楚地在上述王明珂、楊彥杰二文中展現，同時也是 Shepherd 論文提出的「文化聲望的政治學」論點，以及強調對漢化須有「雙向」理解的用意。但是 Shepherd 的漢化觀點與王、楊二文有所不同。延續幾位歷史學家對漢化議題的討論，Shepherd 用台灣平埔的例子論證漢化的討論必須區分涵化 (acculturation) 與同化 (assimilation) 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Shepherd 認為涵化所牽涉到的是文化要素的借用，採借這些可能與聲望有關的文化要素，並不一定牽涉到認同的問題；同化才牽涉到認同。他對漢化的定義是：發生在非中國人與中國人接觸過程中的涵化，就平埔的例子來說，和王明珂的看法類似。Shepherd 強調中國性 (Chineseness) 必須被放置在當地社會過程中去理解。也就是說平埔族人汲取、模仿的文化並不等同於他們接觸的漢人移民或墾荒者的文化，更不等同於中國文化（見下文）。Shepherd 認為：涵化過程中文化要素的借用，是一種「文化聲望的政治學」(politics of cultural prestige)。非中國人借用某種文化要素來提高他們的聲望，而當這種聲望又有助於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時，當然會更具吸引力。所以十七世紀的平埔族認為當時的統治者荷蘭人文化比那些跟他們接觸的漢人墾荒者更具聲望價值；而那些早先進入平埔居住範圍的漢人墾荒者，就採用了平埔的生活方式，贅入平埔家做婿。因為在那個情境中對他們有利。過了一陣子當更多漢人聚落在平埔區域建立時，人群的聲望價值就有了反轉的可能，致使平埔族人開始採用漢人的文化要素以提高他們的聲望。從 Shepherd 的觀點來說，這種甲對乙文化的採借並不意味著甲就變成了乙。

¹² 這個論點在 Donald Sutton (2000) 對從 1715 至 1996 年間流傳於湘西苗漢邊界的白帝天王信仰的傳說分析中，有非常細緻的展現。

Shepherd 強調我們需要在族群接觸過程中去瞭解土著所面對的「中國性」是什麼。這也正是施傳剛的論文希望提醒我們的。¹³ 施文所描述的對象是在滇北麼些人的區域內討土地生活的困頓漢人。王明珂、Shepherd 和施傳剛的論文都不斷提出的問題是：誰是那些與非漢人接觸的「漢人」？在不同歷史情境下，這些「非漢」的土著所接觸的可能是屯兵、墾戶、難民、落難客或是國家政策下的移民，而不盡然是富於國家教化使命感的官員或是隨時準備來辦書院、教土著唸書識字的知識分子，更不一定是集所有想像的「中國性」於一身而抱持著強烈文化優越感的漢人。施文的主角正是如此。在滇北與麼些人生活在一起的漢人既離鄉背井又窮困潦倒，不但沒有形成任何的宗族，甚至還普遍有諸子分家業的習慣，包括房子的建材都得分。看在不作興分家的麼些人眼裡，漢人的貧窮就是因為他們連最起碼致富的道理都不懂。施文強調這些漢人既不自負、又不欺凌，更沒有什麼優越感或同化異己的企圖。

以上討論的文章，呼籲我們在探討帝制中國的族群關係時，必須要瞭解實地文化接觸的脈絡，提醒我們「中國」、「華夏」並不等同於「漢」，而做為國家或族群的「中國」、「華夏」或「漢」的界限也是變動不居的。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說，知識分子或「漢化」能動者本身的族屬身分並不重要。本書中也有其他幾篇論文討論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族群關係，這些論文著重的則是在國家領土界限固定後，新中國及其民族區辨模式的內容。「現代化」與科學是幾位作者的關懷焦點，國家知識分子和民族菁英的角色尤其備受關注。但即使是焦點集中在國家的現代性與科學建構的幾篇論文，作者們也都明白指出：現代中國的國家認同，仍然有其延續自文化及歷史上我群意識的成分。就像

¹³ Sutton [forthcoming] 還從十八世紀湘西苗漢邊緣所發生的族群衝突事件的記錄，更深入地討論了不同時期國家族群政策間的差異，以及地方執行族群政策官員間的差異所造成影響。

Duara (1993) 所強調的，現代國家的認同並不是一種完全嶄新的認同，而是在現代國家體系的框架中，新的國族認同意識與歷史上的文化或族群認同意識協商的結果。王明珂的論文從北川的例子討論中國民族構成論點的核心正是在此。

甲午戰敗後的一連串外侮所激起的國族國家意識，為新中國的建構注入了新的內涵，也就是嚮往西方的科學知識與追求「現代化」。Dikötter、Ralph Litzinger 與 White 的論文分別從種族國家論述、地方歷史書寫以及醫藥衛生論述的層面，討論不同時期對民族內涵的實質化建構。Dikötter 與 Litzinger 的論文著重討論在建構新中國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能動者的角色，White 的論文則同時討論到平原納西人在民族內涵界定上的能動者角色。

Dikötter 自從 1992 年出版《現代中國的種族論述》(*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China*) 以來，就持續討論二十世紀初逐漸在中國發展出來的，以另類科學知識為基礎所建構的國家與族群內涵實體化的論述。Dikötter 指出：漢與中國在今日國際上幾乎成為等同的指涉，「漢」的界限從既有的流動性到今日的固定意象，相當程度來自現代的國族國家主義者科學種族論述的創造。這種科學種族論述的系統性發展，其實是混同在既有的宗族制度與文化論述、中日甲午戰敗後追求新中國的渴望，以及推翻滿清異族統治的革命情緒中產生的。本書中 Dikötter 的論文，即總結他近年來發表的專書與相關論文，討論從清末民初、民國時期到當代中國，知識菁英如何挪用科學知識包括演化理論、頭骨學、古人類學、基因理論、血清學、遺傳學、優生學等，來合法化同化的觀點，實體化黃種人、蒙古人種等種族論述，以做為他們國家建構的內涵。Dikötter 在論文中強調，他不認為「種族」是中國最重要的認同形式，但他認為最需要引以為戒的，是在國族國家主義者的政治中，族群、國家與種族的內涵常被混同在一起而形成的陷阱。

Dikötter 對族群、國家與種族論述混同的憂心，與上文中所提到的，Linnekin 與 Poyer (1990:12) 對於以出生來源做認同基礎的西方族群理論在後殖民國族國家主義蓬勃發展的狀況下，不斷地在政治行動中被鼓吹，而引發強烈族群意識與衝突的憂心是一樣的。「種族的意識形態」和「傳統的創造」正是當代太平洋地區國族國家運動者所使用的國際政治策略或政治行動的形式。

自 1949 年以來，國家與民族內涵的建構，在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大纛下，國家透過強烈意識形態所支配的民族識別工作，依據語言、習俗、居住地和共同心理素質等標準，將族群施以固定分類並加以「少數民族化」，再進一步依據社會演化的框架，判定各民族在演化階段上落後或先進的位置排列出高下。民族的界限與內涵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固定與僵化 (Gladney 1991; Harrell ed. 1995; McKhann 1995)。到了 1980 年代，國家開始真正實現其「多民族的國家」所宣稱的內涵時，這些民族族屬的烙印即使不像種族般有外顯的身體特徵為憑，卻也像種族觀念般確立成為一種依據先天身分而傳承的認同標準。「我是誰」或我的族屬，決定了「我可以或不可以做什麼事，可以或不可以有什麼，是或不是什麼」(Linnekin and Poyer 1990:13)。就像本書王明珂的論文所揭示的，羌的族屬可以使他們在人口及教育政策上得到優惠、在政治生涯上得到特殊照顧；如果爭取地方足夠的人口成為羌族，就可以建立更多的自治鄉、自治縣，從而獲得國家更多的教育與地方建設的補助。與此相反，則像施傳剛的論文所顯示的，生活在麼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漢人，漢的族屬身分侷限了他們在政治生涯上發展的可能性，缺乏讀書、升學受教育的動機。他們認為自己是「在錯地方的漢人」。

從現代性的討論觀點，White 呈現了另外一種科學論述的國家建構。由醫藥衛生的論述與科學和現代性發展間密切的關係出發，White 的論文非常清楚地從國家醫藥衛生論述中，為我們分辨了 1949

年之前、建國後的毛澤東時期、極左大躍進時期、文革時期和 1980 年之後改革開放時期，在各階段不同現代性下所建構的國家內容。在這個現代性的建構中，西醫的科學性使它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整體而言，中西醫學在不同階段下，都受到不同國家現代性建構的需要所形塑。例如 1949 年之後毛時期所強調發展的西醫，是被放置在具有廣泛的普遍性、實用性的公共衛生領域的醫療層面上。而代表中國的中醫（詳見 White 論文中對中醫定義的討論），例如在毛時期所提倡的觀念為「科學中醫」，到了文革時期推行 White 所稱的「整合醫療」，這是一種整合中西醫基本知識的醫療體系，在偏遠農村、山區格外有效地為「赤腳醫生」所用。相對於代表中國的中醫，在社會演化觀點的定性下，被視為來自「落後」地區的民族醫藥，如藏醫、彝醫，或來自封建、舊社會的漢人迷信醫療方式如算命、叫魂、驅鬼等，在 1949 年後就受到國家的貶抑直到 1980 年代之後，才逐漸在「尊重少數民族宗教習俗」的口號下，得到國家的認可；至於不同民族所用的民間草藥雖然沒有被全面定位為迷信，1949 年之後，也只有在大躍進與文革等極左時期以外的相對開放階段中，在偏遠及少數民族地區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White 也指出，這種在國家現代性建構中的文化政治所形成的醫藥衛生論述，雖然有相當的支配性力量，但是從平原納西族的例子來看，他們也從醫療行為中展現了自己特有的現代性論述。

這個納西現代性的論述，在不同時期，的確隨著國家現代性建構的改變而有變化。但 White 認為貫穿 1949 年前後、毛時期到後毛時期，納西民眾最普遍認同的醫療，是以漢人民間流行的陰陽、冷熱、五行運作等中醫概念為體，配合各種草藥（在平原納西例子裡包括後來被明確訂定族屬的中草藥、納西民間草藥）或祖傳祕方使用的「自療」法，或找納西「老中醫」來進行治療的方式。奠基在這套知識之上，文革以來，「整合醫療」成為最普遍的醫療方式。而在後毛時期，由於「民族傳統」、「多元文化」成為形塑國家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形象的必要條

件，納西民間草藥和東巴祭儀也在平原納西追求開放的現代性競爭中一一重現。雖然在老一輩的記憶裡，東巴並不是平原納西城鎮醫療中的一部分。由這些平原納西的醫療行為觀察，White 認為儘管國家建構限定了納西民族建構的界限，但從醫療的角度看來，納西現代性的內容中最主要的部分，仍然是延續他們 1949 年以前特有的對跨越族屬的「象徵資本」文化認同的追求。在過去大家信任的是「老中醫」，雖然他們是納西人，可是他們聲望的基礎是他們的「中醫」（「漢醫」）身分，不是他們的族屬身分。而在當前，最重要的象徵資本則是有市場和國際聲望價值的納西草藥與東巴文和東巴經。這些草藥或經、文如果沒有族屬的標籤就不會有它們現在的身價。

Ralph Litzinger 的論文，又帶領我們回到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議題，而將焦點集中在呈現一位國家級的人類學家——費孝通——的學術見解上。在中國改革開放階段對於科學、真實和權力本質的辯論脈絡中，Litzinger 認為費孝通的著作強調：人類學者的民族研究在改革時期的使命，應該在於更正過去社會主義教條下犯的錯誤，而從理性與客觀的科學原則去探討少數民族的認同問題。費孝通對改革階段的國家現代化建構的看法，則微妙地體現在他對民族地方歷史的書寫上。

Litzinger (2000) 最近出版的專著，探討擁有不同層次權力或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以及瑤族地方、國家與國際各層次的民族菁英，對於瑤或金秀瑤的歷史與文化書寫的重要性。收錄在本書的論文，則專注討論費孝通在 1980 年代初期對金秀瑤認同研究的反思，以及後續撰寫的有關於地方社會研究取向芻議的文章。Litzinger 認為：「從對金秀做為一個瑤的地方的論述中，我們瞭解到無論是瑤或是漢的知識菁英，他們的書寫，都掙扎於如何呈現中國的歷史、它的進展、它的失敗，以及內部族群差異在歷史中所座落的位置。」同時 Litzinger 也認為：對金秀族群衝突與整合的革命史書寫，呈現的是金秀做為 1950

年代打造社會主義中國想像中所屬的一個「地方」的意義。繼而從費孝通對金秀瑤認同史的討論中，Litizinger 指出：這個瑤的認同史，其實是繼續確立了它做為中國國家想像中一個「偏遠地方」的角色定位與意義。當前關於中國這個國家的內涵，仍然在辯論的過程之中，而費孝通所提出的，是他做為一個人類學或民族學家，對改革開放新中國的期望。Litizinger 認為：改革開放時期民族學的復興，在制度層面以及論述層面上，開闢了足夠的空間，讓知識分子得以在意義的層次上，重新檢視並思辯社會主義的過往、少數民族的現況以及烏托邦的現代化承諾的意義。費孝通這位現代中國的知識菁英，對於金秀瑤問題所做的反思，就是在這個檢視與思辯的脈絡中產生的。費孝通對於金秀瑤認同史的研究，一方面為金秀瑤的複雜歷史帶來了新的看法，並為改革時期的新民族學找到了一個新方向，同時也更讓讀者瞭解更多有關於中國地方、文化和權力的政治學（politics of place, culture and power）。

三、遷徙、市場與文化消費的多重性

市場做為不同人群接觸並互為區辨的場合，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定義上，市場可以被界定為人們以經濟理性為基礎，透過以商品為主的交換，促成需求與供給相遇的場所。商品交換的過程，固然可以說是受到經濟理性的主導，但是在這之前，特定需求的形成，以及特定生產與供給的實現，卻高度受到文化與權力的左右。市場做為族群的脈絡化場域，至少可以包括三個不同的面向：第一個面向，是由於市場力量的作用，造成人群的接觸。這其中包括地理相鄰人群在歷史過程中長時間的經濟共生，也包括資本主義市場動力下，較大規模與遠距離的人群自願、半自願與強迫性的遷徙。而第二種情形造成的人群接觸，通常意味著比較明確且固定的群體界限（Castles 2000）；第二

個面向，是族群身分與族群文化的商品化。這通常是先由國家與媒體（包括國家宣傳機構、自主性媒體與跨國媒體）對族群建立起識別或界定的系統，再在這個基礎上興起的族群觀光與族群文化消費的現象（Yoshino 1999）。這種消費行為，雖然在少數場合中，會引起觀眾或消費者對於族群身分或文化「真實性」（authenticity）的質疑，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不論是安分的觀讀消費，還是對真實性的質疑，其實也都同時加強了族群單位的本質化與合法性；¹⁴ 第三個面向，是承接「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議題，注意被識別為「族群」的當事人，如何發揮主動性，在市場與跨國體系的脈絡中，如何設定自己的目標，以及透過消費行為與消費形態鞏固或表達自己的族群認同，或者消費自己的（被客體化了的）文化與族群身分（Costa and Bomossy 1995；Kemper 1999）。這三個面向，也在本書的論文中有所討論。

Baba 是一個在經驗上不難區辨，但在東南亞族群研究或海外華人研究上經常顯得難以捉摸的議題。然而究其困難的原因，其實並不在於現象本身，而是來自「族群」研究固有的概念框架。這個在麻六甲海峽北岸形成的「族群」，在東南亞海洋貿易與殖民歷史的脈絡中，以經濟優勢群體的姿態出現。Jürgen Rudolph 所主張的用「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而非語源學的角度理解 Baba，也正是一種由文本化與脈絡化過程切入的研究取向（雖然這不是他的用詞與觀念）。Rudolph 的研究顯示出：Baba 不是一個可以用文化特質列舉法理解的「族群」現象。事實上，如果要說 Baba 在文化層面上有可以舉出的特徵，那就是「文化合成」（cultural hybridity）與旺盛的文化借採

¹⁴ 認為「文化展演」、「文化商品化」或「族群觀光化」對於族群文化的「真實性」會造成戕害，其實是建立在兩個預設之上：(1)族群文化是有本質的；(2)在國家、殖民主義或資本主義市場勢力擴張前，人群是生活在沒有異己、沒有觀讀者、沒有展演情境的狀態中。而這兩個預設，在本文以及一般人類學的論述中，都不被接受。

與適應。¹⁵ 更重要的是，Rudolph 指出：Baba 的難以界定，其根本原因在於他的「歷史性」(historicity)。Baba 可以說是一個絕佳的例子，說明除了列舉共同文化（甚至體質）特質的方法不足為訓之外，與其寄望一個界限明確的「地理分布」來界定一個「族群」，我們可能更應該注意一個「族群」在歷史過程中特定的「時間分布」。Rudolph 的文章清楚的說明了：族群不是實體，它是一個概念的過程。

相較於 Baba，對於 Daniel Chew 在本書論文中描寫的十九世紀之後砂勞越的華人而言，華人的族群身分或者「華人性」(Chineseness) 就比較不是問題 (non-problematic) 了。雖然我們無由假定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民主革命運動展開之前，就存在一個普遍的「華人認同」——方言群無疑始終都是近代與當代海外華人一個重要的認同標準 (Mak 1995)。但是在布洛克家族 (the Brookes) 統治下的砂勞越，華人移民的引進以及族群身分的維持，都是由國家非常有意識的在濃厚的市場經濟考量下進行的。Chew 指出：布洛克政權明確的基於產業與貿易開發目的而鼓勵華人移民砂勞越，華人市集，基本上是跟隨著布洛克政權（透過建立碉堡）在砂勞越境內的逐步鞏固，亦步亦趨建立起來的。Chew 特別強調華人在砂勞越河流上游內陸地區以土著為主的社會脈絡中扮演「中間人」(middle man) 的角色。這個中間人的角色，透過商品與信貸關係，使得內陸長屋聚落內的土著很緊密的被捲入到一個連接內陸市集、下游市鎮、首都吉晉以及新加坡都會的區域性貿易與金融體系之中；同時也透過林產品的收購與奢侈品（包括陶瓷器、琉璃珠與銅器等）的輸入，使得不同的土著族群，發展出蓬勃活躍的聲望經濟 (prestige economy) 活動。Chew 的文章告訴我們

¹⁵ 還有相當反諷的，在文化合成的脈絡中表現出特別增強的「古典主義」，因此在若干習俗上「比華人更中國」、在詩歌文學上「比馬來人更精緻」、在政治認同上「比英國人更英國」。

內陸的華商如何深入土著社群，並且有很好的機會經過涵化融入到土著社會之中，但是布洛克政權為了統治的理由，有意強調族群的區隔與界限，透過各種政策與規定，阻撓這類情形的發生。

Baba 與砂勞越華人的族群性與族群關係，是在東南亞殖民政體與後續獨立國家的脈絡中形成與發展的。其背後的動力，最初源自於商業動機與跨境移民產生的人群接觸，而後被再脈絡化成為族群及文化消費的現象。同樣凸顯出市場的脈絡化作用，但發生在現代中國境內，而且呈現出另外兩個面向的複雜性的是 Dru Gladney 與 Louisa Schein 的論文。

Gladney 的文章透過「文化園區」(cultural theme park) 的研究，揭示出國家機制與市場機制的結合：國家與優勢族群透過消費少數民族的意象與文化，建構自己。在這篇文章裡，Gladney 則是在概念上延續他近年多篇論文中依賴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理論，在主題上延續「中國國家建構有賴於對周邊少數民族的建構」的論點，進一步藉由夏威夷波里尼西亞文化中心、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與北京民族文化園的比較以及三者間的系譜關係（中國民俗文化村對於波里尼西亞文化中心的模仿），呈現出在一種「東方的東方主義」心態下，國家及優勢民族如何依賴對於少數民族的刻板印象建構對自己的想像，以及少數民族如何呼應地建立對自己的刻板印象。由於這些民俗及民族文化園區經濟上極為成功，Gladney 認為：我們可以說是國家有關單位、台港澳的資金，以及少數民族三者合作建構了意象中的中國。

同樣是著重現代中國市場情境中的族群議題，Schein 的文章則藉由幾個「苗族」文化工作者與企業家的故事，呈現出少數民族與他們的文化在成為消費品之餘，更具有主動詮釋「現代化」意義、改造自身處境、發展出「族群化的消費」(ethnicized consumption) 的趨勢。在她的論文中，Schein 相當鮮活地描繪出：國家與優勢族群對於少數

民族文化的想像與消費，如何讓有能力的苗族人士藉由這種文化消費的市場脈絡，獲得更廣闊的視野、賺取相當實際金錢、同時發展出對本身文化的自信。而在這些故事的背後，又糾纏著微妙複雜的對於「西方」、現代化、民族優劣地位的認知與自我定位叢結。雖然 Schein 對於她田野中所熟識的苗族朋友，是否真能體現「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y) 或「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 並不完全樂觀，源於她認為至目前為止，這些苗族人士在經濟與消費能力上，還沒有穩固到足以真正自由地透過特定風格的消費，來建構自己的族群意象。比較可以預期的仍然是一種文化合成 (cultural hybridity) 的現象。但文章中微觀細膩的討論，卻足以對強調少數民族單方面被國家與市場剝削、被優勢族群奇風異俗化，或被漢人與西方人情慾化的鉅觀討論，發揮互補與平衡的作用。

參考書目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何翠萍

1999 從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幾個個案談「己」與「異己」的關係。刊於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徐正光、黃應貴主編，頁 357-404。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0 生活、人群與禮俗——從人類學的觀點看史語所九十年代以來歷史學者對生活禮俗的研究。刊於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頁 335-363。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沈松僑

1997 我以我血薦軒轅——皇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8:1-77。

鄭振滿

- 1992 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Astuti, Rita
- 1995a People of the Sea: Identity and Descent among the Vezo of Madagasca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5b "The Vezo are not a kind of people": Identity, Difference, and "Ethnicity" among a Fishing People of Western Madagascar. *American Ethnologist* 22(3):464-482.
- Barth, Fredrik
- 1969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Fredrik Barth, ed.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London: Allen & Unwin.
- Bauman, Richard, and Charles L. Briggs
- 1990 Poetics and Performance a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59-88.
- Brown, Melissa J., ed.
- 1996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stles, Stephen
- 2000 Ethnicity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Cohen, Abner
- 1969 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 A Study of Hausa Migrants in Yoruba Tow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maroff, John L., and Jean Comaroff
- 1992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In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John and Jean Comaroff,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Costa, Janeen Arnold, and Gary J. Bamossy, eds.
- 1995 Marketing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Dikötter, Frank
- 1992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uara, Prasenjit

- 1993 De-contra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1-26.

Faure, David

- 1996 Becoming Cantonese, the Ming Dynasty Transition. In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Liu Tao Tao and David Faure, eds. Pp. 37-5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Fiskejso, Magnus

- 1998 On the “Raw” and the “Cooked” Barbarians of Imperial China. *Inner Asia* 1:139-168.

Geertz, Clifford

- 1973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Clifford Geertz,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Gladney, Dru C.

- 1991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nks, William F.

- 1989 Text and Textual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8:95-127.

Hansen, Valerie

- 1999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rrell, Stevan

- 1995 Introduction: Civilizing Projects and the Reaction to Them.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teven Harrell, e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1996 Introduction.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Melissa J. Brown, ed., Pp. 1-1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rell, Stevan, ed.

- 1995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Kemper, Steven

- 1999 The Nation Consumed: Buying and Believing in Sri Lanka. *In Consuming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sian Experiences.* Kosaku Yoshino, ed.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Linnekin, Jocelyn

- 1990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the Pacific. *In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J. Linnekin and L. Poyer, eds. Pp. 149-173.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Linnekin, Jocelyn, and Lin Poyer

- 1990 Introduc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J. Linnekin and L. Poyer, eds. Pp. 1-1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Litzinger, Ralph

- 2000 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cKhann, Charles F.

- 1995 The Naxi and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tevan Harrell, e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itchell, J. Clyde, ed.

- 1969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 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ilverstein, Michael, and Greg Urban

- 1996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iscourse. *In Natural History of Discourse.* Michael Silverstein and Greg Urban,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utton, Donald

- 2000 Myth Making on an Ethnic Frontier: The Cult of The Heavenly Kings of West Hunan, 1715-1996. *Modern China* 26(4):448-500.
[forthcoming] Ethnicity and the Miao Fronti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Donald Sutton, Pamela K.

- Crossley and Helen F. Siu,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lch, Holmes H., and Anna Seidel, eds.
1981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Yoshino, Kosaku, ed.
1999 Consuming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sian Experience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